

弘扬女排精神 建设体育强国

加强侯官历史文化名人海外传播价值的研究

□王兵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体育强国。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历史征程中,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以女排精神为重要代表的中华体育精神。

◆挖掘女排精神丰厚内涵外延,弘扬精神文化

2023年是中国女排入选漳州集训和漳州女排基地成立50周年,中国女排已经49次在此屯兵苦练,从这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铸就了经典的女排精神。

回顾中国女排发展历程,廓清女排精神的形成变迁。女排精神是中国女子排球队顽强战斗、勇敢拼搏精神的总概括,伴随着中国女排的成长而逐渐形成。从“五连冠”到“十冠王”,中国女排经历了创业、辉煌、低谷、传承、发展的过程,谱写了一部砥砺前行奋斗的奋斗史,女排精神也在代代相传中不断注入新内涵。1981年5月,“女排精神”一词首次面世。同年11月,中国女排首获世界杯冠军,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国人带来无与伦比的民族自豪感。1986年,中国女排史无前例摘得五连冠后,《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女排精神自此成为鼓舞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会在会见中国女排代表时指出,“中国女排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强调“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2021年9月,女排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

梳理女排精神时代特征,锚定其与时代的深度契合。女排精神的形成发展嵌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高度契合时代主题与历史发展的需要,既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又在代代相传中诠释新定义。在形成时期(1981年至1986年),喊出时代最强音。中国女排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赢得世界冠军,更史无前例一举摘得五冠王,在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中国奋力追赶的时代,这是对改革开放的欢呼与呼应,以昂扬斗志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能行”。在传承时期(1987年至2012年);坚守拼搏向上。中国女排既有成功登顶的辉煌,也有跌入谷底彷徨,她们胜不骄、败不馁,始终葆有一股不服输的拼劲,打不垮的韧劲,总能在陷入低谷后崛起,用实力

和汗水延续神话,刻画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时代痕迹。在发展时期(2013年至今);永葆推陈出新。新时代以来,科学训练、尊重规律、跨领域合作、大国家队等新理念注入女排精神,通过职业化竞赛改革选拔培养出国际顶级运动员,展示了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复合型团队的力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大国的范本。女排精神早已超出单一的体育领域,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研习女排精神生成机制,彰显我国体育发展制度优势。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赛场,中国女排以优异成绩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体现了中国竞技体育实现快速发展的独到之处。分析中国女排的成功法宝和动力源泉,关键在于“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祖国至上与爱国情怀的激励、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大胆改革与科学管理。女排作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优秀范本,也对其其他竞技体育项目以及体育各方面工作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激励意义。

◆新时代弘扬女排精神,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涵盖了我国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征,其在体育领域的直接体现就在于体育强国建设。

从国家发展层面,弘扬女排精神,建设体育强国,以现代化的体育新发展支撑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这一重要论断将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至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复兴的高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因其鲜明的物质属性和精神特性,有着极强的群众性和关联性,体育强国建设是确保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从精神文化层面,弘扬女排精神,建设体育强国,激发全民爱国热情和拼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精神文化的重要功能,强调要弘扬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以“女排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体育精神,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从高质量发展层面,弘扬女排精神,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

济支柱性产业,对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全民共享层面,弘扬女排精神,建设体育强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重要特征,全过程、全方位、全民化的体育覆盖率是衡量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标。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热爱体育运动、投身体育锻炼,形成积极向上、健康自律的生活方式。

从对外交流层面,弘扬女排精神,建设体育强国,展示综合国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始终以体育为国际关系往来自东方的智慧与活力。1952年,五星红旗首次飘扬在赫尔辛基奥运会赛场;1971年,“乒乓外交”留下“小球转动大球”的体坛佳话;1981年,“女排精神”文化符号构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体育不仅是竞技的较量,更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多元领域的投射,有着独特的功能外溢。正如女排精神所包含的爱国精神、集体精神、奋斗精神、不屈精神等内在意义,同时拥有促进大众认知民族身份、展示良好国家形象、建立世界文化交流平台的功能。

◆在新时代借鉴女排成功经验,高质量建设体育强国的实现路径

建成体育强国必须充分借鉴和运用女排成功的经验,大力弘扬以女排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体育精神,科学谋划、统筹推进、深化改革、攻坚克难,不断推动体育事业各方面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高质量建设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建设党管方向的现代化体育强国。中国女排的成功实践深刻证明,党的领导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制胜法宝,是做好各项体育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把体育事业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局中去谋划和部署。要始终坚持党管体育发展方向、管改革发展、管干部、管人才,把党的体育方针全面贯彻到体育工作各方面。

发挥制度优势,走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强国之路。中国女排的成功实践深刻证明,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创新动力。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实践检验的举国体制,发挥社会主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集聚资源、转换动力和创新机制。要更加注重弘扬科学精神、尊重客观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市场自主三者之间的协调运转和有机融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激发各级政府、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让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相补充的新机制释放出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

深化关键环节改革,让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双翼齐飞。中国女排的成功实践深刻证明,体育强国的基础在群众体育,而外显于竞技体育。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就是要纲要目张,群众体育是根,根深叶茂;竞技体育是本,本固枝荣。要统筹发展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将二者有机统一于体育强国建设中,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做大做优产业体系,培育新体育形态和新经济增长点。2021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3万亿元。未来,要着力打造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不断丰富体育用品和服务,加大对体育赛事、体育培训、健身休闲、场馆运营、制造业转型升级等扶持力度,发挥体育扩内需、稳经济、促消费、激活力的作用。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体育,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加快职业体育发展,深化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念好“山海经”,做大做强“体育+”的文章。

擦亮体育文化名片,以女排精神的特有效应凝聚力量。应擦亮女排精神文化名片,深入挖掘女排精神符号的文化意蕴,感受中国女排在不同时代展现出的勇往直前、坚韧不屈的中华体育精神。通过文艺作品,具象女排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传递中国主流价值观念。电影《夺冠》、纪录片《女排姑娘》、长篇小说《女排》等将新老女排的传承过程及符号内容向大众传播,吸引大众与之互动、学习,为女排精神的传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要大力弘扬女排精神,建设体育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体育智慧、体育力量。
(作者为福建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专家建言

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刘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农业农村部自2022年开始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以加快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深入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可以促进农业经营增收,带动农民参与乡村特色产业,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进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拥有一定规模,具有组织新型化、经营市场化、主体多元化、技术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等特征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四种类型。与传统小农经营主体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规模化服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是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富裕的重要力量,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规模化优势,可以有效整合农村资源,促进农业经营增收,带动农民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有助于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和守住耕地红线。其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产业化优势,可以通过兴办现代企业延伸产业链,通过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升价值链,通过引入新技术新理念带动产业优化升级,提高农村产业整体规模效益,有力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第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服务带动作用,可以有效辐射带动普通农户,促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共同经营,还能承担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实施和农村基础设施运行维护,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近年来,我省积极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22年开始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中再次强调要“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截至目前,我省共有家庭农场11.1万余家,经营土地面积451万余亩;农民合作社4.3万余家,成员91.3万余人,农民成员85.5万余人,辐射带动203万余户增产增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97家,其中国家级77家。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促进我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村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一是规模化程度还不够大。适度规模化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省“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条件和部分农户不愿流转土地的社会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面临土地资源整合难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二是规范化经营还不够好。规范化经营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程度上存在内部组织松散、日常管控较差、管理机制缺失等不规范问题,直接制约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三是产业化水平还不够高。产业化生产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目前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程度上存在产业化水平不高、产业链延伸不足等问题。以农民合作社为例,从事产业涵盖粮油、肉蛋奶、果菜茶菌等领域,种植业约占60%,服务业占比不足6%。四是合作联合还不够强。合作联合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这方面还存在不足,包括:合作服务领域比较窄,跨区域合作发展比较少;合作生产经营产业同质化严重,集中在种植业、养殖业;利益联结不够紧密,联合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弱,没有形成基于双向奔赴的真正利益共同体。

针对上述问题,应基于我省农业农村实际情况,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加快推动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持续推动规模化经营。一方面,要落实有关政策。采取适宜方式和有效措施,积极落实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有关惠农强农政策的落地见效,积极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满足其高质量发展对农村资源尤其是土地的整合需要。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积极入社。鼓励成员以土地经营权、林权、闲置农宅、实物、现金、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作价出资入社,引导农户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和“共同发展”,从而扩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规模与数量,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的“建设者”。

积极引导规范化运行。第一,夯实思想基础。通过教育引导,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农民合作社成员和家庭农场成员,充分认识规范经营的重要性,强化他们的规范意识、市场意识和法治意识,夯实规范经营的思想基础。第二,建立制度机制。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的财务会计、家庭农场“一码通”管理等规范运营基础性制度,探索建立规范化管理长效机制,努力做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规范一个、提升一个”。第三,加强监督管理。加强对新型农业主体的综合监管和财务监督,依法依规进行注销“空壳社”“僵尸社”等,倒逼新型农业主体规范经营。

着力提升产业化水平。第一,发挥人才作用。人才是产业振兴的第一资源,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化水平要想方法念好“人才经”。要念好“育才经”,着力提升乡村本土的“原乡人”水平;念好“引才经”,着力吸引更多“新乡人”加盟;念好“借才经”,着力借用科研院所和异地

人才等“他乡人”资源,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作用。第二,注重科技赋能。通过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等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第三,做足特色文章。提升产业化水平应避免同质化。不同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因地制宜、因势而动,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我省当前实施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3212”工程,念好“土”“特”“产”三字经,立足“本土”,突出“特色”,注重“产出”。

探索新型经营路径。创新是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升的源头活水,只有坚持创新才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第一,结合新形势新需要延伸产业链。可以根据新阶段农业发展需要,探索在生产领域创设作业标准,通过技术培训、农机作业、农资供应等社会化服务模式,帮助农户实现标准化生产。第二,探索实践新型合作方式。可以探索实践“土地流转+优先雇佣+社会保障+”“农民资金投入+保底受益+按股分红+”等新型合作模式,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分享到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增值受益。同时,还可以探索实践由一家龙头企业牵头、多个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参与的“1+N+N”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模式,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与小农户之间形成更具稳定性、约束力和竞争力的经营联合体。第三,探索实践新型经营方式。结合农村产业发展要求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加深的实际,以农业为第一产业,加工为第二产业,旅游、服务、电商、物流等为第三产业,通过技术创新、要素渗透、模式重构等方式促进融合发展,努力实现1+1+1>3的总体性效果。此外,还可以探索尝试龙头企业与村集体直接对接、村集体办公司等联结模式,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

(作者为武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由于朝代的更迭,地理区域建制的变化,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侯官包含的地理范围亦多有变动。不管理地域大还是小,侯官的名称一直存在。今天谈论侯官文化,有地理的基础但不拘泥于地理概念,我们更加看重的是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历久弥新的文化精神。

明清以来,侯官的历史文化名人不仅在境内享有盛誉,部分名人在东亚、东南亚和欧美地区也颇具影响。学界目前较多关注的个案有明末清初东渡日本创建黄颢宗的隐元隆琦大师;侨领黄乃裳带领同乡远涉重洋,拓荒开垦,创建了蜚声海外的马来亚砂拉越州诗巫“新福州”垦场;翻译家陈季同在近代中欧文化关系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集翻译家、西文作家、诗人与文化使者于一身,他不仅将西学带到中国,更将中国文学名著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

侯官历史文化名人海外传播的价值研究,既可以梳理不同时期侯官名人在海外传播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也可以是侯官名人的功绩受到海外各界的关注与好评。前者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而实际上后者也很重要。以林纾为例,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林译小说,影响了鲁迅、郭沫若和钱锺书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不仅如此,近年来国外的汉学研究者也关注到林纾的小说翻译

长期以来,有关福州历史文化名人与海外的关系研究基本侧重于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而忽略了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在海外的影响力。以林则徐为例,这位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政治家、思想家,非常注意了解外国情况,曾组织翻译西文著作,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其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滄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他的禁烟主张和虎门销烟受到了马克思的称赞。1858年,马克思在所著《鸦片贸易史》专论里就肯定了林则徐的这一禁烟壮举。国际联盟把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日”;1987年12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又把虎门销烟结束的翌日(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具体而言,目前学界关于侯官历史文化名人的海外传播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就学术理路而言,侯官历史文化名人海外传播研究存在重个案事实陈述而轻整体理论概括的倾向。二是就传承理念而言,目前侯官历史文脉的赓续存在重中国近代影响而轻海外传播的倾向。三是就创新实践而言,学界有关侯官历史文化名人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实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推进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和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增添新动力,鉴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针对性地采取以下策略。

强化整体研究意识,从学术层面凝练出侯官文化的首要特质;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若从整体层面概况侯官历史文化名人在海外传播中的贡献,具体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进行评析:一是专业领域层面的贡献。侯官历史文化名人“门类齐全,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译家,几乎囊括了各个领域”。他们在海外发挥影响力的首要因素主要源于他们的专业贡献,政治家贡献政治智慧,思想家贡献思想观念,翻译家贡献翻译作品。二是地方文化交流层面的贡献,这在海外华人圈表现得尤为明显。1900年,黄乃裳招募福州乡亲去诗巫垦荒,移民者多来自于福州侯官、闽清、福清等地的农民。他们带上农具和农作物种子在异国他乡辛勤耕种,相继定居后诗巫便成为福州同乡乡的聚集地,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故乡文化元素,福州话、闽剧以及福州特有的民俗文化随处可见。三是中华文化传播层面的贡献。这是侯官历史文化名人在海外传播的终极贡献。

就常理而言,任何地方的历史文化名人都有可能海外产生重要影响,为何侯官的历史文化名人如此集中,又在近代中国和海外传播中具有如此影响力?排除我们熟知的个人努力与客观环境等因素之外,显然这一地域集中蕴含的特有的文化精神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目前,学者多从海洋文化(船政文化)、儒家文化和移民文化等角度来概括闽都文化的特质,如冒险精神、爱国精神、包容开放等。而在明末清初东渡日本创建黄颢宗的隐元隆琦大师、带领同乡远涉重洋创建了蜚声海外的马来亚诗巫“新福州”垦场的黄乃裳身上,我们感受最为强烈的是他们那种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只有领会到这一核心特质,侯官历史文化名人海外传播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才有立足之本。正是这些侯官名人具备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才赢得海外的普遍赞誉。

秉持文互鉴理念,从宣传层面补强侯官历史文化名人海外传播的短板。

实际上,侯官历史文化名人海外传播的价值研究基于一个宏观的理论前提,即中华文化中的“和合共生”理念是加强文明互鉴、解决文化冲突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侯官历史文化名人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明代福清人叶向高携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来闽传教,同时传播西学文化。当时福州诸多文墨之士与其交友论学,互相切磋,虽有观点交锋,但开放包容的心态毕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艾儒略在传教之余,潜心研究儒学经典,并拥护利玛窦“合儒”“补儒”的传教路线,对儒学和天主教义亦采取调和的态度,故而被明中人称为“西来孔子”。因此,抱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在文明互鉴中获得合作共赢的因果。

近年来,福建省或福州市在打响“闽都文化”或“侯官文化”品牌方面确实下了很多功夫,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的侯官文化拼图还缺少了历史文化名人的海外传播和影响力这一块。林纾故居陈列了他的文集、书信、译文及编选的古文教材,唯独不见美国学者韩嵩文教授的英文专著。三坊七巷诸多名人故居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另外,在省市区县各类文化宣传或文旅、学术活动中,都要树立全面完整地推介侯官历史文化名人的自觉意识。

倡导以文化促合作,从实务层面发挥侯官历史文化名人在国际城市交往中的纽带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以本区域历史文化名人的海外影响力作为桥梁来加强与海外国家、城市间的合作,是大多数省市缔结友好城市的最初考量。福州在1980年10月20日就与日本长崎市缔结友好城市,源于300多年前隐元高僧首次赴日弘法就是在长崎的崇福寺和兴福寺。实际上,福州还可以借助陈季同在出使法国巴黎时的影响力,考虑与巴黎的城市合作。侯官人的杰出代表林则徐铜像已竖立在美国纽约街头,纽约的“唐人街”随处可见听到福州话,市政府也可以以此作为纽带,加强与纽约的城市合作。

那些在海外享有盛誉的侯官历史文化名人,不仅是祖国的家乡与贡献国外的城市之间的纽带,也是中外关系的见证者、亲历者和贡献者。具体的研究思路为,一是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专业领域、地方文化和中华文化三个层面来整体描述侯官历史文化名人的贡献;二是运用实地考察等方法,从个人原因、外在环境和文化传播等层面剖析侯官名人海外传播的原因;三是运用文献分析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挖掘侯官历史文化名人海外传播的价值。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